

巴蜀作家

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BASHU ZUOJIA

YU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DE FASHENG

彭超◎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編
古今圖書集成



巴蜀作家

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BASHU ZUOJIA
YUZHONGGUO XIANDAI WENXUE DE FASHENG

彭超◎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彭超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2

ISBN 978 - 7 - 5161 - 4695 - 8

I. ①巴… II. ①彭…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文学史研究
②作家评论—四川省—现代 IV. ①I209.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348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303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李 怡

彭超的博士论文要出版了，作为这篇论文的所谓指导教师（其实是第一个读者），我深感欣慰，由此也联想到一些区域文化的研究问题，借此在这里说一说。

如同“进化论”是推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一样，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一直在“不甘落后”“迎头赶上”的焦虑中发展自己。能够抓住“时代发展的需要”完善自己，曾经是文学史研究的主要着力点，这样的学术框架可以被概括为一种对“时间意义”的挖掘。

文学史通常被我们置放在运动变化的逻辑上来加以梳理，这就是所谓“时间意义”，新时期以来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处理，都不断在这一角度上来讨论问题：“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当然是为了反驳文学对于政治的依附，但问题的着眼点却是“时间”，通过前移与后挪，政治关键点的价值就从文学视野中淡出了；海外（美国）汉学形成了对中国现代文学“五四起源观”的挑战，双方争议的焦点也集中于究竟“五四”还是“晚清”可以成为历史的起点；严家炎先生最新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著，其亮点之一就是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至黄季同发表的《黄衫客传奇》；苏州大学更有机会继续前移，有纳入晚明“现代”的设想。

除了“起点”之争，经常需要我们回答的还有“分期”问题，所谓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经典分期已经深入人心，当代文学分割出了“十七年”、“文革”、“新时期”、90年代与“新世纪”。

但是，仅仅是“时间”，似乎并不能揭示文学史研究今天面对的许多

问题。

例如，近年来学界关于“民国文学史”的讨论，这个概念的提出究竟可以为我们的研究贡献什么新的思路呢？有学者认为是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学运动“被人遗忘”的几年，那么，补充了这几年，文学史的价值是否就完整了呢？当然，也有学者进一步怀疑：文学史的时间起点是不是一定与政治一致？这几年是否真的那么重要？

在我看来，可能，根本的问题还不在时间上的纠缠和讨论，重要的也不在遗忘或者补充几个年头。今天，应该特别重视文学史的另外一重意义——空间的意义。

强调文学史流变的时间意义，在于一重假设：文学史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生改变的，所谓“一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显然，这里包含了某种比较简单的“进化论”思想，这里不是说文学与时代变迁无关，而是说真正的变化必须引入另外一个重要的视角——空间。20世纪如爱因斯坦、霍金等人的宇宙观恰恰给了我们更为丰富的“相对”性的启示：没有绝对的时间，也没有绝对的空间，时间总是与空间联系在一起，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时间。

这样表述并不是一种文字的游戏，而是意味着一系列新的解释文学发展的思维框架。

其一，什么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过去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是置放在整个世界文化与文学共同进程之中，辨析资本主义文化的东移，讨论西方文化的“中国化”过程，这里虽然包含了某种空间的意识，但整体的时间流动依然被看作是根本的动力。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尤其是与西方文学）的关系被视作一系列新变的源头；但是，如果引进空间为基础的概念可能情况就大为不同，这就是今天国外学术界也逐步讨论到的思维“世界现代性”或“多元现代性”，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经验完全可能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区域中发生。鲁迅的日本体验给了他新文学创作的重要启示，但李劫人却不是在留学法国以后才开始白话新文学创作的，时间甚至比鲁迅还早，在成都这样中国自己的近代都市也可能诞生自己的现代文化的形态和要求。在今天，考察李劫人的现代意识，肯定与鲁迅

等其他作家并不完全一致。就像邓幺姑与祥林嫂，与繁漪根本不一样。

其二，只有抓住了空间，才从根本上把握住了文学发展的细节。民国文学讨论中，曾经有学者担忧，民国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到苏维埃政府、边区政府等，如此不同，怎么便于“整合”在一起呢？其实，这种整合不同区域、不同空间才能写文学史的认识还是根本上忽略了文学存在的根本——空间，依然将共同的时间意义的寻找作为文学讨论的目标。其实，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恰恰就是因为民国社会的特殊的空间破碎性给文学发展不同的空间背景，北洋政府的文学空间场域与国民政府不同，延安文学与国统区文学根本不同，乃至重庆的大后方文学与昆明的大后方文学也大相径庭，七月派存在的中心——重庆与中国新诗派存在的中心——昆明与上海各自的空间意义差异很大。

第三，空间意象往往是作家捕捉感受的基础，也是我们借以窥视作家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总是愿意强调作家的“时代意识”，而忽略了支持这些“时代意识”的具体的空间意识，这样一来，现代作家的独创性很可能由此被掩盖。例如巴金的《家》一直被我们当作反叛封建家庭文化的表现，如若仅仅是这样，家族文化就不只是巴金的感受和发现，甚至，也远远不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但是，问题在于，批判封建礼教、反思家族文化这些概念本身就是“时代的命题”，换句话说，也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间意义”的主题，并没有完全揭示巴金的具体空间感受。回到巴金的空间意象，我们可以发现，这里不是在抽象地议论家族礼教，而是讲述成都“高公馆”的生存问题，而公馆，恰恰并不是简单的农业时代的封建庄园，而是近代城市文明发展的产品，公馆屹立于民国时期的城镇，建筑形态中西结合，生存方式亦新亦旧，高公馆不是封建官宦的贾府，也不是才子佳人会聚的大观园，而是特殊的中国式商业城镇的市民空间，在这个空间，悲剧缘何产生，不是简单的“封建”二字可以完全解释的。当然，高公馆也不同于李劫人的郝公馆，这里涉及一个作家如何权衡“空间意象”与“时间意象”的关系，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越是具有强烈的空间意象的捕捉能力的作家，其独创性也越大。

总之，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焦虑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进一步强化自身的“空间意识”。如果说，我们曾经以对“时间意义”的敏感拉动了文学史研究的发展，那么，对“空间意义”的关注则可能深化我们的历史认识，在这个角度上说，文学史研究的“空间”阶段已经到了，我们需要特别加以注意。

显然，这就是目前我们从事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也是彭超博士这一著作的意义。关于巴蜀文化之于现代四川文学的价值，曾经是我研究的方向之一，当初彭超决定选择这一论题之时，我是极力支持的，这并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研究做得有多好，恰恰相反，我觉得 20 年前（1994—1995）的研究真的过于简单和肤浅了，早应该有更为精深的著作问世，虽然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著作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但论者至少有了进一步推进的勇气和愿望，对于巴蜀这一宏富的文学空间而言，还需要有更多像彭超博士一般的有志之士，而文学研究的空间意识的加强，则会最终推动我们业已僵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2013 年 11 月于励耘居

前　　言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一般被界定为晚清至“五四”。在这过程中，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时关注的焦点。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间的关系在“断裂”说与“继承”说之间游走。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常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且多定位于单向影响。在这古今中外纵横之间的阐释中，众多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作家被淡化其地域身份特征。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学发生之间的关系成为相对漠视的领域。但作为子系统的区域文化及区域文学不可能脱离母系统中国文学。不同的地域文化会赋予作家不同的气质特征，他们在参与现代文学发生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同的表现。新文学的诞生需要破除旧势力的重重围裹，因而要求参与其中的作家既具有深厚的学识修养与才情，同时也需必备开拓创新的勇气和胆识。据此，具有“敢为天下先”之精神的巴蜀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成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试图以发生学的方法还原历史现场，探析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间存在较强的互动。新文学发生的时代潮流激活了巴蜀作家的创造力，巴蜀作家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胆略引领并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本书主要分为三部分，山雨欲来风满楼——巴蜀新文化发生的前奏、百花园的芬芳——群体篇、星光灿烂——个体篇，论证巴蜀作家是如何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起到引领、促进作用。

第一编主要论述巴蜀人是怎样站在时代浪潮的前端，把握时代的脉

搏。笔者以史料为依据首先论证现代报刊业的发达缩小了四川与外界的距离，留学热潮促使四川人走出夔门连通了四川与西方的桥梁，让川人睁眼看世界。然后从川人对专制政治、专制思想的反抗论证巴蜀文化的叛逆性。由此可见，川人开阔的视野与叛逆的特质是他们能够引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前提。

第二编全方位地从戏剧、诗歌和小说等领域论证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间的关系，将巴蜀作家以群体的姿态呈现于早期中国现代文学史。戏剧以曾孝谷、蒲殿俊等为例，报刊杂志以《娱闲录》、《少年中国》，文学社团以《草堂》和《浅草》等为例，从戏剧、诗歌、小说三个不同的领域说明巴蜀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诞生所起到的引领促进作用。

第三编以巴蜀作家个体为单位，论证时代浪潮在激活巴蜀作家创造力同时，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所起到或引领或促进推动的作用。本编首先从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的作者叶伯和谈起，再到康白情、吴芳吉、郭沫若与李劫人。笔者认为五四巴蜀作家同气相求的文学理论及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绪论	(1)

第一编 山雨欲来风满楼——巴蜀新文化发生的前奏

第一章 睁眼看世界 巴蜀文化的时代性	(19)
第一节 发达的报刊业推动四川对外界的了解	(19)
第二节 报刊的兴起与现代教育观念之转换	(22)
第三节 留学热潮开拓广阔的视野	(25)

第二章 巴蜀文化的叛逆精神

第一节 对专制体制的反抗 ——以《鹃声》、邹容等为例	(28)
第二节 对专制思想的反叛 ——以廖平、吴虞为例	(33)

第二编 百花园的芬芳——群体篇

第一章 巴蜀作家与戏剧的现代化进程	(43)
第一节 曾孝谷与春柳社、文明戏	(45)

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第二节 蒲殿俊与“爱美”剧改革	(53)
第三节 巴蜀作家的戏剧文学创作 ——以蒲殿俊、陈翔鹤等为例	(59)

第二章 巴蜀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以《娱闲录》、《少年中国》等报刊为例	(64)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酝酿与早期巴蜀报刊 ——以《娱闲录》等为例	(66)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与走出川外的巴蜀作家 ——以北京《晨报》、《少年中国》等为例	(81)

第三章 巴蜀早期新文学刊物

——以《草堂》等为例	(93)
第一节 《草堂》的诞生	(94)
第二节 青春的旋律 ——《草堂》的诗歌	(100)
第三节 苦难大地上的人们 ——《草堂》的小说	(107)
第四节 四川早期诗刊 ——《孤吟》	(116)

第四章 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共同成长

——以《浅草》为例	(121)
第一节 狂奔在歧途的漂泊者们 ——《浅草》小说的现代性	(123)
第二节 感受苦难 ——《浅草》小说的现实主义	(133)

第三编 星光灿烂——个体篇

第一章 叶伯和与中国早期白话诗歌	(141)
第一节 叶伯和生平及著述考略	(142)
第二节 白话新诗实践的先行者	(147)
第三节 叶伯和诗歌的艺术特点及意义	(151)
第二章 康白情诗歌	(155)
第一节 康白情盛衰及生平杂考	(155)
第二节 康白情诗歌丰富的内容	(159)
第三节 康白情诗歌艺术创造之表现	(169)
第三章 吴芳吉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	(177)
第一节 寒梅傲雪的人生	(179)
第二节 吴芳吉诗歌创作概况及主要内容	(181)
第三节 吴芳吉诗歌鲜明的艺术特点及意义	(187)
第四章 中国新文学成就的杰出代表	
——郭沫若	(193)
第一节 郭沫若早期新诗创作	(194)
第二节 郭沫若早期小说	(214)
第三节 郭沫若早期剧作论述	(221)
第五章 中国白话小说的开启者	
——李劫人	(229)
第一节 早期现代白话小说与李劫人创作起点考略	(229)
第二节 李劫人五四之前的白话短篇小说	(232)
第三节 李劫人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	(245)

第六章 五四前后巴蜀作家同气相求之关系与关于新诗建设的探讨

——以郭沫若、吴芳吉、康白情等为例	(259)
第一节 五四前后巴蜀作家同气相求之关系	(260)
第二节 巴蜀作家诗论概况及特点	(267)
第三节 巴蜀作家关于新诗建设的探讨	(271)
结语	(287)
参考文献	(289)
后记	(300)

绪 论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欲挣脱传统文学的束缚，以西方文学为学习对象的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学形式，故而，“传统”与“西方”成为学界阐释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两大主要依据。参与其中的中国现代作家本身所具有的区域文化特征常被漠视或淡化。但是，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中国具有不同质态的地域文化，例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燕赵文化，等等。来自不同地域文化圈的中国作家是如何以其不同的方式参与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并对其发挥了如何不同的历史作用？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学术领域。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便属于这样一个研究领域的课题。

有关区域文化与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是伴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热而逐步展开的。1990 年，杨义先生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20 世纪 90 年代，严家炎先生主持编撰了一套《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大型丛书。与此同时，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民俗、文学与传播等文化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认识的深化。

在《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中，严家炎先生对有关区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研究意义以及需要涉及的多学科领域等作了扼要而精辟的论述，从刘勰《文心雕龙》对楚辞诗经南北产地与风格差异的归纳，初步接触到地域与文学之关系，到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中，对南北朝时期江左河朔南北词人得失大致情况的有意比较，说明文学有地域性这一客观事实，再到 19 世纪法国文学史家丹纳《英国文学史》引言，明确地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看作是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由此以文

学品种风格与地域的联系，揭示了地域对文学产生影响这一文学发展的客观真理。

在此基础上，严家炎先生指出上述观点的局限性，主要是对于地域的理解过于狭窄，似乎将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相对忽视构成人文环境的诸般因素。强调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除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外，还应该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其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严家炎先生还特别指出：“区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包括近百年来对外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新传统文化在内。对于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20 世纪中国新文学是在西方近代文学的启迪下兴起的。但就具体作家而言，往往同时也接受着包括区域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的影响——有时是潜移默化的濡染，有时则是相当自觉的追求。”^①

强调区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实则体现了一种多元共生的文学史观，文学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十分复杂，不是单靠几个大家的创作或影响或局限于少量都市创作繁荣就能够完成，而是受到多种因素多种文化生态的影响，过去的文学史对此有所忽略，进而导致对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的遮蔽，极为不利于对现代文学史客观演变轨迹的认识和发展规律的把握。

在过去的现代巴蜀文学研究中，同样长期存在着因地处西南而容易被忽视等许多问题。在现代文学史上，巴蜀地区作家数量和作品质量在全国各省都名列前茅。当代学者李怡先生曾据《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和阎纯德《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分册》作过统计，四川作家数量均排位第三，仅位居江浙两省之后，再以所谓的通行座次排名前六名的文学大家，鲁郭

^① 严家炎：《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理论与创作》1995 年第 1 期。

茅巴老曹，四川与浙江各占两位，并列第一。^① 这虽不是绝对的，但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巴蜀文学的成就，说明其地位和影响不容忽视。

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巴蜀文学的成就并未能得到应有的评价，有关研究状况也很不平衡。除了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芜等少数几位大家常常被作为全国学术界普遍研究的重点之外，相当多的作家研究较为或极为薄弱，许多曾取得突出成绩、作出重要贡献并在当时有较大影响者甚至完全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

就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而言，巴蜀作家在思想、戏剧、诗歌、小说、文学理论乃至翻译等领域都取得了许多成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目前国内数量众多的现代文学史专著却因各种原因较少或几乎全无论及。这种情况较为普遍，如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作为教育部高等教育重点教材，该书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影响颇大。其第一编即第一个十年（1917—1927）的论述中，除了对郭沫若有专章论述外，有关四川作家在新文学几大体裁方面的贡献多被忽略。第一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中，仅仅提到了吴虞在《新青年》撰文反孔，揭露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扼杀。同时又提到浅草社的林如稷、陈炜漠、陈翔鹤三位四川作家。有关这个时期的小说共两章，评介了问题小说、自传小说甚至旧派小说作家数十人，四川作家同样只有林如稷、陈炜漠、陈翔鹤三人小说的简要论述。此时已创作发表小说近百篇，并被称为现代白话小说创作早于鲁迅的李劫人完全不见踪影。诗歌方面，论述中提及的人名数量超过小说，但论及的四川诗人唯康白情一人，寥寥数语，也承认其《草儿》集与俞平伯的《冬夜》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新诗集。”^② 而被郭沫若等人称为“中国的泰戈尔”的四川诗人叶伯和在正文中未见只言片语，^③ 在该章附录的出版事件年表中对1920年5月叶伯和继胡适《尝试集》晚两月之后出版的中国现代第二部新诗集，也未有丝毫记载。更有甚者，其有关叙事诗论述直接说道：“‘五四’以来叙事诗仅有朱湘的《王娇》、沈玄庐的《十五娘》、

^① 参见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②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③ 参见张义奇《成都的“泰戈尔”》，《成都日报》2004年3月10日。